

# 打好政策组合拳：减税影响小微企业退出吗\*

林 超 尹 恒

**内容提要：**减税本应是支持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却发现减税反而引起小微企业退出。基于2009—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的匹配数据，本文以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发现减税会显著提高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这种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减税政策产生减税效应的同时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最终反而带来小微企业退出概率提高。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效应在无研发、服务业、高劳动密集度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了政策组合的重要性：减税本身并不足以实现政策目标，只有相应政策配套起来，进一步规范税收征管，才能更好地发挥减税政策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减税 小微企业退出 税收征管 政策组合

**作者简介：**林 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2；

尹 恒（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07-0023-17

## 一、引言

小微企业是就业韧性和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其生存问题事关社会经济发展全局。超过70%的新增就业和再就业集中在小微企业，而且同样的资金投入，小微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是大中型企业的4倍以上。<sup>①</sup>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小微企业贡献了约60%的GDP和50%的税收。<sup>②</sup>如何设计使小微企业存活下去的政策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McKenzie和Paffhausen，2019）。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新趋势及驱动力研究：基于企业行为的微观视角”（721731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企业环境下税收的超额负担研究”（7187313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营商环境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23XNH007）。本文曾在第九届香樟经济学会报告，感谢与会者的建议。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尹恒电子邮箱：yheng@ruc.edu.cn。

① 《小微企业已成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和社会就业主渠道》，中国政府网，2014年3月31日。

②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202/996740.html>）。

减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为了扎实推进“六稳”“六保”工作,尤其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方面,最大程度实现“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中央出台了减免“六税两费”、增值税起征点、所得税减半征收、延缓纳税等大量扶持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sup>①</sup>那么,减税政策究竟如何影响小微企业生存?由于数据和可信识别框架的缺乏,极少文献能对这一问题给出解答。

基于2009—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的匹配数据,本文借助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来回答前述问题。上述数据集能够提供小微企业详细的财务信息,尤其是涉税信息,可以清晰地了解小微企业税收减免情况,同时可以精确识别出小微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时点。大多数面向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针对查账征收企业的,核定征收企业被排除在外,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亦如此。然而,自2014年起,核定征收企业也被允许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这为本文识别减税对小微企业生存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以是否为核定征收企业为处理组识别条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减税政策使得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显著提高25.53%。这种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减税政策产生减税效应的同时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最终反而引起小微企业退出。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效应在无研发、服务业、高劳动密集度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了政策组合的重要性,减税本身不足以实现政策目标,减税的同时不应伴随着征管的强化。换言之,减税还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以规范税收征管,2017年起,各省(市)逐步推行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政策在税收征管层面上可能与减税政策形成良好配合,2022年9月开始实施的《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政策进一步将税收征管的规范化、税收执法标准的统一化扩展到区域层级,这些都是有益的政策尝试。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四点。第一,关于减税对企业的影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申广军等,2016;刘啟仁等,2019)、研发创新(杨国超等,2017;刘诗源等,2020;Chen等,2021)和融资约束(王伟同等,2020)等的影响。但极少文献关注到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McKenzie和Paffhausen,2019)。田磊和陆雪琴(2021)构建异质性企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模拟数据研究发现减税可以降低宏观企业退出比率,但微观证据是否支持这一发现?这一发现是否适用于小微企业?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未可知。本文对这一支文献形成重要补充。

第二,关于减税降费与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为何政府减税力度大而企业获得感不强?张克中等(2020)以“金税三期”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信息监管技术进步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彭飞等(2020)发现减税伴随着企业非税负担的提高。本文发现减税产生了征管强化效应,从而企业实际总负担可能并未降低,最终引起小微企业退出,丰富了这一支文献,且进一步将其因果链条延长到企业退出。

第三,关于减税政策导致的企业行为扭曲。减税政策在执行中可能会因为征纳双方的偏差导致实际效果达不到政策目标,引起企业行为扭曲。已有文献多从纳税人(企业)角度进行考虑(杨国超等,2017;王伟同等,2020;Chen等,2021),发现纳税人会通过操纵报表等方式违规享受减税政策,本文从征税主体角度切入,发现减税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这体现了政策组合的重要性,减

<sup>①</sup> 具体见《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5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4号)、《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号)等政策文件。

税政策应与征管规范政策配合使用,以避免减税政策执行偏差,本文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关于企业退出。既有文献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企业退出问题时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毛其淋、盛斌,2013;高凌云等,2017;张璇、李金洋,2019;唐珏、封进,2020;熊瑞祥等,2021),存在两个局限性,一是无法讨论小微企业退出问题,二是只能根据企业财务信息或者是否在库来判断企业退出与否,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的匹配数据,可以较好地处理这两个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介绍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的背景,引出留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实证策略,阐述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第四部分展示基准实证结果、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探究减税政策带来小微企业退出的因果传导机制;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1.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sup>①</sup>

国务院于2008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小微企业可以享受20%的优惠税率(法定税率为25%),所称小微企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对于工业企业,其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且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对于其他企业,其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且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此后,考虑到低税率的优惠力度有限,不足以解决小微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在低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增加减半征收优惠,并逐步拓宽减半征收优惠适用的企业范围。具体来说,自2010年起,除低税率优惠之外,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的小微企业还可以另外享受所得减半征收优惠。2012年开始,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6万元的小微企业也可享受减半征收优惠;2014年,享受减半征收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不超过6万元提高至10万元;2015年1月至9月,提高至20万元;2015年10月,进一步提高到30万元(见表1)。至此,减半征收优惠涵盖了全部小微企业。假定某企业2016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若按法定税率缴税,应纳税额为7.5万元(30×25%),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后,实际应纳税额为3万元(30×0.5×20%),实际减免了60%的税款[(7.5-3)/7.5]。

表 1 2008—2016 年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额度变化

时间	减半征收标准(万元)	优惠税率(%)	认定标准(上限)			法定税率(%)
			应税所得(万元)	资产(万元)	人数(人)	
2008—2009 年	—	20	30	工业企业:3000 其他企业:1000	工业企业:100 其他企业:80	25
2010—2011 年	3					
2012—2013 年	6					
2014 年	10					
2015 年 1—9 月	20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	30					

① 与既有文献一致(冯晨等,2023;王伟同等,2020),本文所称小微企业指的是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小型微利企业。

## 2. 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

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两种,分别为查账征收与核定征收,前者是指企业根据账簿信息自行计算缴纳税款,事后税务机关查账核实;后者是指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sup>①</sup>核定企业的税额或应税所得率,企业据此缴纳税款。为便于税收征管,早在2000年,国家税务总局就规定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不得享受任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sup>②</sup>为了支持核定征收企业生存与发展,在2008年,以新企业所得税法<sup>③</sup>的实施为契机,中央政府允许核定征收企业享受免税收入优惠政策(比如国债利息收入),但除此之外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仍然不允许其享受。<sup>④</sup>具体到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进一步明确规定,核定征收企业不适用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3. 2014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扩围

考虑到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小微企业自身规模小、利润低、抗风险能力弱,为了扶持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更好发挥小微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政府允许核定征收企业自2014年起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sup>⑤</sup>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减税政策意味着税收收入的下降,采取的应对策略可能是强化征管以保障税收收入。<sup>⑥</sup>从实践来看,2019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大幅扩围<sup>⑦</sup>的同时,相应的税收征管力度也加强了,具体表现为《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答复汇编》中明确表示分支机构即使独立纳税也不能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并修改了纳税申报系统规则,分支机构自此无法在系统中勾选小微企业优惠,在政策文本和系统规则两方面加强了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管理。

由于2014年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推开的,为本文识别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可以将核定征收企业作为处理组、查账征收企业作为对照组,基于小微企业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识别减税政策冲击的效应,这避免了多时点渐进推开政策识别中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TWFE)所面临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及其估计偏误问题(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2020; Goodman-Bacon, 2021)。

## (二)理论分析

结合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特征和现有研究结论,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减税与小微企业退出的关系,并据此引出研究假说作为实证分析的基本依据。

① 总体要求为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业特点,综合考虑企业的地理位置、经营规模、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等因素,分类逐户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应税所得率,保证同一区域内规模相当的同类或者类似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基本相当。

②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38号)。

③ 新企业所得税法指的是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法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

④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77号)。

⑤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3号)。

⑥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彭飞等(2020),他们发现“营改增”行业企业的非税负担增加,原因是“营改增”使得政府提高了对这些企业的非税收入征管力度。

⑦ 此次所得税优惠大幅扩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放宽了小微企业限制,调整为满足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更多企业被纳入小微企业范围;二是提高了税基式优惠的力度,首次出现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最低降到5%。详见《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



减税会影响企业退出吗?从既有文献来看,似乎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Guo(2021)发现在经济下行期间,对于美国的跨州经营企业而言,位于高税率州的工厂退出概率提高,同一企业内处于低税率州的工厂退出概率却下降了15%。Guo(2021)的发现和经济学直觉是一致的,直觉上,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税负,从而使得企业存活下去。Gurley-Calvez和Bruce(2008)却发现,对企业减税可以延长企业生命,而降低企业雇员面临的边际税率会缩短企业存续时长。就本文关注的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而言,是面向企业提供的减税政策,理论上也应降低小微企业的退出概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减税政策存在减税效应,可以降低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

然而,单一减税政策能否抑制企业退出呢?从农业税的取消来看,陈晓光(2016)和Chen(2017)基于区县级数据,利用强度DID的方法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税收征管,使得企业税负提高。换言之,农民减税,企业增负。贾俊雪等(2019)发现,地方政府“减税不减收”,利用2000—2010年县级数据和PSM-DID方法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后地方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减少,而且非农部门的税收收入没有显著增加,间接证明了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其他涉农税费的征管以弥补农业税取消导致的财力损失,导致本应作为减税政策受惠主体的农民总体税费负担很可能没有减轻。也就是说,农民减税不减负。将视角从农民减税转移到企业减税上,彭飞等(2020)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非税负担,其内在逻辑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营改增”带来的财政压力冲击,增强了对于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最终加重了获得减税支持企业的非税负担。从既有文献来看,减税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地方财政压力,从而提高征管水平,这对抑制企业退出是不利的。特别地,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减税政策也可能伴随着其所面临的征管水平提高。《中国税务报》的多篇报道指出,小微企业享受优惠将面临更高的税务稽查概率(马泽方,2015;陈日琳、蒋茵茵,2023),各地税务局网站的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也公布了多起针对小微企业的检查。<sup>①</sup>据此,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的假说2。

假说2:减税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这可能导致小微企业退出。

减税政策本身及征管强化效应还可能对企业生死存亡造成影响。一方面,企业申请享受减税政策是有成本的(Finkelstein和Notowidigdo,2019)。比如,企业申请享受减税政策会面临填写相应表格并准备证明材料等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征管强化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大成本应对税务机关的检查(李长志,2019),而且税务机关检查可能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比如税务机关在工作时间的上门检查可能会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sup>②</sup>小型微利企业本身规模小且利润低,叠加上述两方面因素,存在征管强化效应的减税政策可能会加速小微企业退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作为缺乏征管规范政策配合的减税政策,其总效应可能表现为小微企业退出。

① 例如,黄冈市税务局对蕲春县红灯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检查发现,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隐瞒企业固定资产超过5000万元的事实,错误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要求其补缴税款并进行罚款。黄冈市税务局对湖北众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检查发现,其因接受不合规发票,不再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再如,天津市税务局检查天津易旺祥商贸有限公司发现,该小微企业少列收入,要求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相关规定补缴税款。

② 税务检查中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象的询问多在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还需进行实地调查取证,详见《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和《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

### 三、实证策略

####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借助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该政策于2014年实施提供了时间维度变异,政策面向核定征收企业提供了个体维度的变异,以上两个维度构成了DID的核心解释变量。具体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Exit_{ipt} = \alpha + \eta Treat_i \times Post_t + \gamma X_{ipt} + \varphi Z_{p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pt} \quad (1)$$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p*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

$Exit_{ipt}$ 为被解释变量,是反映小微企业是否退出市场的虚拟变量,位于*p*省份的*i*企业在第*t*年注销则取值为1,否则为0。

$Treat_i$ 为分组变量,若小微企业*i*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则赋值为1,进入处理组;否则赋值为0,进入对照组。 $Post_t$ 是时间维度的虚拟变量,2014年及以后年份取1,否则取0。二者的交乘项构成了核心解释变量 $Treat_i \times Post_t$ ,表示企业*i*在第*t*期是否受到减税政策冲击,本文关注的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eta$ ,该系数度量了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净效应。

其他变量方面,为了控制微观和宏观层面可能影响政策实施和企业退出的一些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 $X_{ipt}$ 和 $Z_{pt}$ ,以实现条件不相关(Li等,2016)。其中, $X_{ipt}$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企业规模(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资产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和企业年龄 $\{\ln[\text{当前年份}-\text{成立年份}+(12-\text{成立月份}+1)/12]\}$ 等。 $Z_{pt}$ 为省份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财政自给率(自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变量。为了控制企业个体层面与整体宏观环境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模型(1)中加入企业固定效应 $\delta_i$ 和时间固定效应 $\mu_t$ 。 $\varepsilon_{ipt}$ 为随机误差项。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全国税收调查。全国税收调查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保证调查样本与总体情况基本相符。与研究企业退出问题中常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比,全国税收调查覆盖的企业规模范围更广,包括众多小微企业,并且支持识别企业是否核定征收,包含大量涉税信息,这为本文研究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奠定了良好数据基础。(2)全国工商信息,来自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全国工商信息提供了企业的经营状态信息,可以精确识别出企业退出时点,以避免根据企业财务状况定义企业退出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3)企业所在省份宏观层面的财政经济信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为避免金融危机导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干扰,并且考虑到2017年小微企业政策界定条件发生变化,<sup>①</sup>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2009—2016年。

需要说明的是,匹配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的处理过程。本文首先根据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逐年将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进行初步匹配,具体为分别从全国税收调查、全国工

<sup>①</sup> 《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7〕43号)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小微企业认定条件中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商信息数据里的纳税人识别号信息中识别并提取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并据此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之所以提取出组织机构代码信息后匹配,而不直接用纳税人识别号匹配的原因在于样本期内发生了“三证合一”的登记制度改革,<sup>①</sup>这会导致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发生变更,但是改革前后均能从中提取出唯一的不变的组织机构代码,从而克服了“三证合一”改革的影响;其次,我们根据企业名称和地址进行补充匹配,在此步骤中,我们对企业名称进行了细致充分的清理,具体清理过程包括删除企业名称中可能影响匹配结果的括号和空格、统一企业名称中数字和字母的字体格式等;最后,我们依据企业曾用名、所在区县、四位数行业和成立时间等多变量信息进行了审慎地匹配和人工校对。

在匹配完成的基础上,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观测值;(2)删除明显不符合逻辑的观测值,比如职工人数为负数或0值的观测值;(3)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这些关键变量包括资产总额、职工人数和应纳税所得额等;(4)将各连续型变量在前后1%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以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5)考虑到汇总纳税企业的特殊性,剔除汇总纳税企业样本。最终样本中包括的采取核定征收和查账征收方式的小微企业样本合计为2030208条观测值。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退出	虚拟变量,以注销度量	2030208	0.0047	0.0683	0.0000	1.0000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2013632	0.5868	0.5429	0.0000	3.0848
企业规模	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2030208	2.3961	0.9481	0.6931	4.6151
资产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2030208	7.4952	1.7513	0.0000	11.0006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2004754	-0.2747	1.2649	-9.4000	0.7723
企业年龄	$\ln[\text{当前年份}-\text{成立年份}+(12-\text{成立月份}+1)/12]$	2030208	1.6818	0.8098	-0.4055	3.3232
经济水平	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2030208	10.6242	0.4859	9.2409	11.6801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2030208	43.5664	9.9673	28.6000	80.2322
财政自给率	自有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2030208	0.5412	0.1938	0.1483	0.9314

注:企业年龄变量存在负数与其定义有关,企业年龄的定义为 $\ln[\text{当前年份}-\text{成立年份}+(12-\text{成立月份}+1)/12]$ ,若企业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取对数后的企业年龄变量小于0。采用这种定义企业年龄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将企业年龄定义到月份,得到的估计结果比以年份定义更为精确。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显示,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013,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第(2)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微观

① “三证合一”改革指的是由原先的工商部门发放工商营业执照、质量监督部门发放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机关发放税务登记证,改为由工商部门统一发放一个营业执照。

层面的一些特征,第(3)列进一步控制省份宏观层面的经济特征。从经济显著性来看,第(3)列中  $Treat_i \times Post_t$  项的系数为 0.0012,说明相较于对照组,减税政策使得处理组小微企业的退出概率相对提高,结合表 2 描述性统计中企业退出的平均可能性 0.47%,减税使得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提高了 25.53% ( $0.0012/0.0047 \times 100\%$ )。基准回归结果支持了理论分析部分的假说 2、假说 3,与之相对应地,假说 1 并不成立。<sup>①</sup>

表 3 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

变量	因变量:企业退出(均值:0.47%)		
	(1)	(2)	(3)
$Treat_i \times Post_t$	0.0013*** (0.0004)	0.0012*** (0.0004)	0.0012*** (0.0004)
资产负债率		-0.0006*** (0.0002)	-0.0007*** (0.0002)
企业规模		-0.0010*** (0.0001)	-0.0010*** (0.0001)
资产规模		-0.0010*** (0.0001)	-0.0010*** (0.0001)
盈利能力		-0.0003*** (0.0001)	-0.0003*** (0.0001)
企业年龄		0.0065*** (0.0003)	0.0064*** (0.0003)
经济水平			-0.0000 (0.0009)
产业结构			-0.0001*** (0.0000)
财政自给率			0.0166*** (0.0014)
常数项	-0.0014*** (0.0001)	0.0017** (0.0007)	-0.0012 (0.0107)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030208	1991394	1991394
组内 R <sup>2</sup>	0.0044	0.0055	0.0056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退出存在正向影响,这似乎与直觉不符,因而需要对此结论的稳健性进行充分细致的检验。在本部分,本文将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同期政策干扰、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

<sup>①</sup> 在后文的机制分析部分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征管强化效应及其逻辑机理。



法、更换回归模型等方面,以增强本文基准结果的可信度。<sup>①</sup>

### 1. 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减税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而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识别假设是假如不存在减税政策冲击,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趋势是一致的,基准回归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支持。因而,本文进一步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Exit_{ipt} = \alpha + \sum_{j=-4, j \neq -1}^2 \theta_j Treat_i \times Post_{t+j} + \gamma X_{ipt} + \varphi Z_{p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pt} \quad (2)$$

其中, $j$ 表示距离政策实施时间(2014年)的相对时点。模型(2)其余部分定义与模型(1)一致。如果 $\theta_{-4}$ 到 $\theta_{-2}$ 并不显著异于0,那么说明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前的第2~4期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出事件研究法的估计结果,本文在图1中提供了模型(2)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theta_j$ 的走势,横轴是距离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2014年)的相对年份,纵轴是系数 $\theta_j$ 的大小,以改革前一年(2013年)为基期,显著性水平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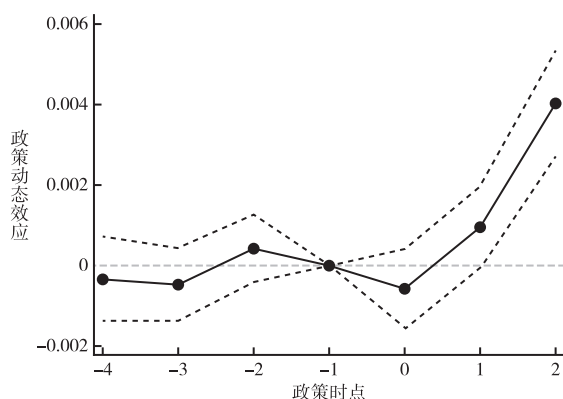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图1说明相对于改革前一年,改革前的系数 $\theta_j$ 并不显著异于0,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减税导致小微企业退出结论的有效性。

### 2.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较长(2009—2016年),在此期间财税系统进行了较多改革,部分改革措施可能会对本文识别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造成干扰,为排除可能的混淆性因素干扰,本文对可能干扰本文识别结果的相关政策进行进一步处理。

在本文样本期内,除了本文所关注的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之外,“营改增”政策可能也会产生减税效应,进而影响小微企业退出,干扰本文识别结果。因此,本文对“营改增”政策进行控制并重新回归。此外,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减税效应最终会体现在企业的营业税与增值税负担总和上,借鉴张克中等(2020),本文控制企业的营业税与增值税负担总和。<sup>②</sup>结果均保持

<sup>①</sup> 限于篇幅,除平行趋势检验之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案。

<sup>②</sup> 增值税与营业税负担总和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之和占营业收入之比来度量。

了相当的稳健程度。

已有文献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自动落地,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响应程度并不高(Cui等,2022),若企业不响应税收优惠政策,则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并不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为了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推动税收优惠落地,2008年起各省份国地税系统逐步推行税收优惠申请享受程序的事后备案制改革,简化申请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程序,这可能会强化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从而降低小微企业退出的概率,干扰本文识别结果。因此,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备案制改革的推广进程,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备案制改革政策干扰后,本文基准结果仍然是可信的。

减税政策的执行不能不考虑税收征管,因此,有必要排除样本期内推广的“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金税三期”工程自2013年起在重庆、山西、山东(除青岛外)三个省市试点,2014年推广到河南、内蒙古、广东(除深圳外)三个省区,2015年新增试点十四个省份,2016年全面推开。“金税三期”工程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张克中等,2020),为控制其对本文识别结果的干扰,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金税三期”工程虚拟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Treat_i \times Post_t$ )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

正如前文表1所示,样本期内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减税力度存在变化,虽然只有2014年将减半征收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6万元提高至10万元与本文所关注的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时间一致,为确保本文结论的可信性,本文还是就减半征收限额变化从两个思路进行了进一步处理。一种思路是利用减半征收政策不变的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万元的企业在2010—2016年始终可以享受减半征收政策,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6万元的企业在2012—2016年始终可以享受减半征收政策,这两类子样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发生变化。另一种思路是直接同期(2014年)受减半征收政策变化影响的样本剔除,既然2014年减半征收政策将年应纳税所得额的限额由6万元提高至10万元,受此次减半征收政策变动影响的主要是年应纳税所得额在6万~10万元的企业,相应地,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6万元或超过10万元的企业不会受到此次减半征收政策变动的影响,将这些企业作为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本身的减税力度提高因素干扰之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可信的。

### 3. 企业退出的重新度量

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本文以注销来测度企业退出,为了避免企业退出的测度方式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避免测量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并排除企业不同退出方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更换企业退出的测度指标重新进行回归。根据企业退出方式的不同,本文定义了测度企业退出的替代性指标:(1)“企业退出2”变量,将企业注销和吊销均定义为退出;(2)“企业退出3”变量:将不是正常经营状态(非存续、在业状态)的企业均定义为退出。将替代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进行验证,结果均未改变基本结论,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 4.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

考虑到处理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可能并不完全可比,借鉴Tian等(2022)的做法,本文利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针对PSM适用于截面数据而DID适用于面板数据的情况,现有文献主要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构造截面PSM,将面板数据转化为截面数据进行匹配;二是参照Böckerman和Ilmakunnas(2009)的做法,采用逐期匹配方式。虽然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一定不足,将面板数据转化为截面数据进行处理可能存在“自匹配”问题,而逐期匹配可能导致匹配对象在政策

前后不一致(谢申祥等,2021),但这两种方式仍是现有条件下较好的研究思路(白俊红等,2022)。因此,本文分别使用面板数据转化法和逐期匹配法两种方式进行PSM处理,相互对照。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将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企业年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财政自给率等设定为匹配变量。(2)分别按照两种匹配方式得到两套数据集:构造截面PSM,即运用近邻匹配方法为处理组寻找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最优对照组,将非共同支撑部分剔除,从而得到新数据集;采用逐期匹配方式,主要是将样本进行逐年匹配,然后将各年份匹配后数据纵向合并至一个数据集中,生成回归需要的面板数据。<sup>①</sup>考虑到PSM的敏感性,除1:1有放回的近邻匹配外,本文还进行了1:3近邻匹配与核匹配(Epanechnikov内核,带宽为0.06)。(3)运用DID方法重新估计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结果仍然表明减税导致了小微企业退出,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减税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是稳健的。

#### 5. 更换回归模型

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退出虚拟变量,由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有效性依赖于对分布的假设,假设较为严格,若不满足假设条件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因此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了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估计。但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也利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参考唐珏和封进(2020)的做法,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改为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并不改变基准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

本文还就抽样权重、对照组设定、企业纳税身份变化、市场结构动态变化等方面可能的混淆性因素进行了讨论和检验,结果均支持基本结论。<sup>②</sup>

#### (三) 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基本证实减税与小微企业退出的因果关系,接下来进行异质性分析考察上述效应对不同类别企业的影响,以拓展对减税的小微企业退出效应的认识。<sup>③</sup>

##### 1. 研发的差异

对于企业而言,研发既是机会也存在着风险(何晴等,2022),研发成功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而研发投入会占用企业资金,若研发失败则意味着沉没成本的增加,严重时可能引起企业动荡(Doi,1999)。Fernandes和Paunov(2015)基于智利数据研究发现,研发创新虽然会增加企业内部风险,但这些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退出概率却更低。本文将样本分为是否有研发投入的两类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表明减税主要是显著提高了无研发小微企业的退出概率。这一结果与Fernandes和Paunov(2015)的发现一致,有研发的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退出概率没有显著变化。

##### 2. 行业差异

已有文献发现,资本存量更高的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存活下去的概率也更高(Rovigatti和Mollisi,2018)。换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劳动要素投入更多的企业在遇到外部冲击时退出概率可能也更高。区分服务业、农业、工业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减税的小微企业退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企业上,原因可能是服务业企业劳动要素投入更多。为了更加直接地验证这一点,本文区分劳动密集度高低分组回归,超过样本劳动密集度中位数的为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其中,劳动密集度以职工人数除以营业收入并取对数衡量,回归结果表明高劳动密集度企业受政策冲击影响

① 限于篇幅,对PSM-DID估计有效性假设的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案。

② 限于篇幅,这些讨论内容未在正文中展示,留存备案。

③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案。

更为显著。

### 3. 其他方面的差异

区分所有权性质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减税的小微企业退出效应在私营企业中更为凸显,而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的退出来看,减税政策的减税效应似乎超过了征管强化效应,从而降低了退出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对于税务中介组织的服务利用更为充分,应对税收征管更加游刃有余。区分利润率高(利润率通过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衡量,超过样本利润率中位数则为高利润企业)的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在高利润企业中更为凸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利润企业受到税务机关更多关注。区分企业规模大小(企业规模以员工人数度量,超过样本员工人数中位数则为大规模企业)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更小的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原因可能是小企业的生死存亡对政策环境更为敏感,这与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课题组的调查报告<sup>①</sup>结论一致。

## 五、机制分析

根据本文研究假说,减税政策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这可能造成小微企业退出。大量文献已证明减税政策会导致地方税务部门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从而提高征管力度(陈晓光,2016; Chen, 2017; 贾俊雪等, 2019; 彭飞等, 2020),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2014年核定征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是否也存在上述现象?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企业所在地的财政压力越大,则当地越有激励强化征管以减轻财政压力,从而这些企业面临的征管强化效应更大,相对来说最终的退出结果应该也会更显著。为了考察这一点,本文区分企业当地(地级市)的财政压力大小分样本回归,若当地财政压力大于全国地级市中位数则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其中,财政压力以财政预算内收入除以财政预算内支出衡量。<sup>②</sup>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组别,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大于基准回归结果;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组别,减税政策的小微企业退出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减税政策带来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令人担心的一点是,财政压力与征管强化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本文也尝试用基期(2009年)的财政压力水平来定义当地财政压力的相对大小,表4第(3)、(4)列报告了以基期财政压力水平分组的结果,并不改变前述结论。

表4 机制分析:财政压力的影响

变量	因变量:企业退出			
	(1)	(2)	(3)	(4)
	当地财政压力		当地财政压力	
	大	小	大	小
$Treat_i \times Post_t$	0.0035*** (0.0011)	0.0004 (0.0005)	0.0033*** (0.0010)	0.0006 (0.0005)
微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① 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课题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摘要)》,中国政府网,2014年3月31日。

②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续表 4

变量	因变量:企业退出			
	(1)	(2)	(3)	(4)
	当地财政压力		当地财政压力	
	大	小	大	小
宏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142 (0.0393)	-0.0047 (0.0147)	0.1414*** (0.0501)	0.0051 (0.0143)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21199	1302690	396023	1327866
组内 R <sup>2</sup>	0.0075	0.0060	0.0067	0.0063

注:不同组别之间样本量差异较大的可能原因在于财政压力定义在地区层面,而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

更直接地,如果前文逻辑成立,从企业端来看,也应当看到减税对征管力度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借鉴 Cai 和 Liu(2009)的做法,征管力度以推算利润与报告利润之差的倒数来度量,数值越小,即推算利润与报告利润越接近,说明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为便于解释,取相反数,即征管力度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其中,推算利润=总产出-中间投入-财务费用-工资总额-当期折旧-间接税,报告利润为企业所报告的年度利润。表 5 中第(1)列以征管力度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减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这也与贾俊雪等(2019)的发现类似。

进一步地,既然企业面临更强的征管力度,那么也会在企业的税负中有所体现。一些文献发现减税政策存在“跷跷板效应”,减税政策下企业所交的某项税收减少伴随着其他税费负担的增加,从而其整体税费负担可能并未下降(彭飞等,2020)。基于此,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所得税方面的减税政策,我们进一步考察企业面临的除所得税以外的税费负担以及总税负的变化。具体地,本文以企业除所得税之外的各项税费<sup>①</sup>占营业收入之比的对数值来衡量其除所得税之外的税费负担,结果表 5 第(2)列所示,企业面临的其他税费负担显著提高。从总税费负担来看,第(3)列的结果表明企业所面临的总税费负担并没有下降,反而略有提高。<sup>②</sup>

正如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所指出的,征管强化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应对税务机关的检查,而且税务机关检查可能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这也可能带来小微企业退出。从现实数据来看,这可能表现为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提高<sup>③</sup>以及企业营业收入的下降。具体地,以财务与管理之和费用的人均值(万元)以及营业收入的人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5 第(4)列和第(5)列所示,表明处理组企业的财务与管理费用显著提高、营业收入显著下降。换言之,不管是从应对成本还是从经营活动来看,伴随着征管强化效应的减税政策都给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① 除所得税之外的税费负担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社会保障基金等主要税费项目。  
② 虽然并不显著。  
③ 企业申请减税政策的相关成本也会在此体现出来。

表 5 机制分析

变量	征管力度	除所得税之外的税费负担	总税费负担	财务与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1)	(2)	(3)	(4)	(5)
$Treat_t \times Post_t$	0.0230*** (0.0051)	0.0036*** (0.0006)	0.0003 (0.0006)	0.0245*** (0.0090)	-1.3307*** (0.3824)
微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宏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1133*** (0.1898)	0.2544*** (0.0183)	0.2441*** (0.0191)	4.8044*** (0.0031)	9.1953 (18.3062)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782996	1941090	1928533	1965835	1991394
组内 R <sup>2</sup>	0.0086	0.1101	0.1102	0.0073	0.0957

综上,减税影响小微企业退出的机理在于减税政策伴随着财政压力下的征管强化效应,这导致企业面临的除减税政策所涉税种以外的税费负担显著提高,整体来看核定征收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没有降低企业总税费负担,还提高了企业应对征管强化的成本,并且对企业营收造成了不利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助 2014 年小微企业核定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9—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与全国工商信息的匹配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并没有抑制小微企业退出,反倒加速了小微企业退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政策效应在无研发、服务业和高劳动密集度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显著,减税政策导致小微企业退出的原因在于减税政策在产生减税效应的同时,伴随着财政压力下的征管强化效应,最终造成了小微企业退出。

本文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加力提效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首先,促进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应打好政策组合拳。仅考虑减税政策可能达不到助企纾困的目的,还需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来配合,推动税收征管规范化。从现实政策层面来看,为了规范税收征管,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发布《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税发[2012]65 号),提出了指导思想,而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8 号)才提出规范税收征管的大体思路,各省级税务机关据此规定本省范围内的税收征管具体事项的执行基准<sup>①</sup>,其目的是实现同省份范围内的税收征管规范化(汤晓建等,2021)。中办、国办于 2021 年 3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21]12 号),要求“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推进区域间税务执法标准统一”,以此为契机,在省内征管规范化的基础上,《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京津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

① 比如《辽宁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批)》(辽宁省国家税务局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 年第 15 号)、《河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 号)、《山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8 号)。

的相继发布标志着跨省份的征管规范化工作正在进行。未来应当考虑全国范围内的征管规范化,税收执法标准的统一化。

其次,应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同减税政策相配合,税收征管制度本身就是营商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税收执法应坚持“无风险不打扰”,依托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税收监管新体系,全方位提高税收监管能力,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在严厉打击税收违法行为的同时应最大程度避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完善核定征收政策设计,允许核定征收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从当前政策规定来看,除免税收入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外,核定征收企业并不能享受综合利用资源减计收入、购置环保设备抵免税额、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应扩大核定征收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范围,以更好发挥实现“双碳”目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定征收企业力量。

#### 参考文献:

- 1.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6期。
- 2.陈日琳、蒋茵茵:《营业额猛增,企业盈利为何“原地踏步”》,《中国税务报》2023年8月15日。
- 3.陈晓光:《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 4.冯晨、刘冰、叶永卫:《减税激励与异质性投资反应: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
- 5.高凌云、屈小博、贾朋:《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有更高的退出风险》,《世界经济》2017年第7期。
- 6.何晴、刘净然、范庆泉:《企业研发风险与补贴政策优化研究》,《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 7.贾俊雪、秦聪、孙传辉、张珂玮:《中央地方利益协调下减税政策的增收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6期。
- 8.李长志:《企业内部如何应对税务检查及国内税务检查的新趋势》,《纳税》2019年第28期。
- 9.刘启仁、赵灿、黄建忠:《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 10.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 11.马泽方:《哪些税收优惠项目可能被抽查——小微企业篇》,《中国税务报》2015年9月1日。
- 12.毛其淋、盛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 13.彭飞、许文立、吕鹏、吴华清:《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基于“营改增”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 14.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 15.谢申祥、范鹏飞、宛圆渊:《传统PSM-DID模型的改进与应用》,《统计研究》2021年第2期。
- 16.汤晓建、张俊生、林斌:《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1年第6期。
- 17.唐珏、封进:《社保缴费负担、企业退出进入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的证据》,《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6期。
- 18.田磊、陆雪琴:《减税降费、企业进入退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 19.王伟同、李秀华、陆毅:《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 20.熊瑞祥、万倩、梁文泉:《外资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经济发展还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管制?》,《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4期。
- 21.杨国超、刘静、廉鹏、芮萌:《减税激励、研发操纵与研发绩效》,《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 22.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 23.张璇、李金洋:《僵尸企业、退出行为和资源错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3期。
- 24.Böckerman, P., & Ilmakunnas, P., Unemployment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Health Economics*, Vol.18, No.2, 2009, pp.161-179.
- 25.Cai, H., &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9, No.537, 2009, pp.764–795.

26.Chen, Z., Liu, Z., Suárez Serrato, J. C., & Xu, D. Y., 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1, No.7, 2021, pp.2065–2100.

27.Chen, S. X.,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47, 2017, pp.62–76.

28.Cui, W., Hicks, J., & Xing, J., Cash on the Table? Imperfect Take-up of Tax Incentives and Firm Investment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208, 2022, 104632.

29.De Chaisemartin, C., & D’Haultfoeulle, X.,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0, No.9, 2020, pp.2964–2996.

30.Decker, R., Haltiwanger, J., Jarmin, R., & Miranda, J.,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Dynam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4, pp.3–24.

31.Doi, N.,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 Exit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13, 1999, pp.331–337.

32.Finkelstein, A., & Notowidigdo, M. J., Take-up and Target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NAP.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4, No.3, 2019, pp.1505–1556.

33.Fernandes, A. M., & Paunov, C., The Risks of Innovation: Are Innovating Firms Less Likely to Die?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7, No.3, 2015, pp.638–653.

34.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254–277.

35.Guo, A., The Effects of State Business Taxes on Plant Closures: Evidence from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axation and Multi-Establishment Firm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pp.1–45.

36.Gurley-Calvez, T., & Bruce, D., Do Tax Cuts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Longevity? .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61, No.2, 2008, pp.225–250.

37.Li, P., Lu, Y., &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23, 2016, pp.18–37.

38.McKenzie, D., & Paffhausen, A. L., Small Firm Dea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101, No.4, 2019, pp.645–657.

39.Rovigatti, G., & Mollisi, V.,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Estimation: The 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 Using Stata. *The Stata Journal*, Vol.18, No.3, 2018, pp.618–662.

40.Tian, B., Lin, C., Zhang, W., & Feng, C., Tax Incentives, On-the-Job Training,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75, 2022, 101850.

## **Policy Mix Matters: Does Tax Reduction Affect the Exit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LIN Chao, YIN H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Summar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MSEs) are crucial pillar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ir survival is a matter of significant concern. How to devise policies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global attention. A key policy is tax reduc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many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o support MSEs, but their exact impact on their survival remains unclear.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and reliable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s, few studies have provided definitive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issue by utilizing data matched from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from 2009 to 2016, focusing on policy reforms related to the assessment-based tax collection of MSEs. The dataset provides detail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on MSEs, particularly tax-related information, allowing for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ax reductions received by MSEs and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market entry and exit points. Most tax incentive policies are targeted at enterprises subject to audit-based tax collection. However, since 2014, assessment-based enterprises have also been allowed to enjoy these preferential income tax policies, creat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for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s on MSEs.

This paper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and finds that tax reduction polic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xiting MSEs.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under greater fiscal pressur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hile these policies generate a tax reduction effect, they also strengthen the tax administration. These two effects have opposing impacts on MSE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ir market exit due to their combined influence.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mix. In other words, tax reductions need to be complemented by appropriate policy measures to better regulate tax administration, thereby better leverag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his paper's contributions are fourfold. First,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 on enterprises,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xtensively studied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 on enterprise investmen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 on the exit of M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Second, regarding the failure of the government's significant tax reduction efforts to be translated into strong enterprise benefits, this paper offers an explanation. Third, on the distortion of enterprise behavior due to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ax reduction policies may fail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effects due to biases from both tax authorities and taxpayers, leading to distortions in enterprise behavior. Existing literature often considers this from the taxpayer's perspective, while this paper approach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x authority, finding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is accompanied by a strengthening of tax administration,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mix. Tax reduction policies should be complemented by standardized tax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to avoid implementation biases. This study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inally, concerning enterprise exits, existing literature may suffer from measurement errors due to data availability constraints. By using match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issue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Tax Reduction, Exit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Tax Administration, Policy Mix

**JEL:** H25, H32, D40

责任编辑: 照 蕴